

《人类共同的基础》

——一个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信徒在当前世界

所坚信的核心价值与意义

张 源

一、引言

克莱斯·瑞恩教授(Claes G. Ryn)的新书《人类共同的基础——多元文化世界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A common Human Ground-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3)严格说来,其实并非“新”作。早在2000年春,瑞恩作为特邀杰出学者,曾在北京大学作了以“异中求同”(Unity Through Diversity)为主题的系列讲座,这些演讲经翻译整理,结题为《异中求同:人的自我完善》,并于翌年8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人类共同的基础——多元文化世界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一书就是在2000年北大演讲的基础上作了适当增删,为面向西方读者而除去了一些适用于中国读者的注解,结构布局与主题并无改变,可以与中译本比照阅读。不过,新著不“新”,并不意味着观念陈旧或过时,事实上,本书的出版,恰恰表明作者多年前所讨论过的那些问题在今天仍旧有着紧迫的现实意义:正如瑞恩在新书序言中所说,本书源于数年前在北大所做的系列讲座,彼时作者在进行哲学探究之前,一开始便就当时的全球社会与政治语境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民族、社会以及文化间的紧张关系是否能够得以缓解?而此后发生的骇人听闻的9·11事件,立刻粗暴地印证了当时所讨论的题目对于当前现实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凸显出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紧迫性。确实,“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就是各民族和各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危

险”,^①那么,面对当前的种种冲突与危机,特别是为了避免9·11式的悲剧不再重演,瑞恩教授在书中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路径呢?

二、核心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瑞恩的提法是,要建立不同民族和个人和谐共处的基础,应从道德文化层面来入手。——这种说法甫一提出,对于某些人来说,一定不啻于冷水浇头(anti-climax)。因为,道德训诫式的老生常谈与“科技的进步和普遍的启蒙”相比,似乎真有些不切实际,同时与那些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举措,如“民主”和“自由市场”等最热门的方案相比,更显得不合时宜。但是,瑞恩教授立刻提请我们注意,只要看一看上个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血腥的一个世纪,我们就会承认,科技昌明仅仅为人类提供了为所欲为的手段,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举措不过怠慢了和平相处之道德与文化的前提。在今天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文化上的相异性是造成各民族与个人发生冲突的主要因素。人们要想在这个日益变小的世界中相互调适、彼此协同与宽容,就必须要有了一定的意志与想象力,——再讲具体些,就是要有克制自我的意志和对“人类共同的基础”的想象力。那么,什么又是“人类共同的基础”呢?那就是人类经验中包含着的超越了特定社团的道德与美感因素。在一个比当前多元文化论更为宏观的哲学和历史背景下,我们不仅会看到关于人类多样性的种种例证与表现,更会看到实实在在的跨越历史与文化的共同特征,而唯有这些非主观性的、不受时空限制的因素才有可能构成联系共同人性的纽带。

在瑞恩看来,人性共同因素能否或如何调适文化的多元性,涉及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正是千百年来西方哲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在直接具体经验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并通过其表面上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全部人生,但(西方)哲学家们却倾向于取消其中一方的终极意义而认为另一方才是现实的,这实际上就对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构成了两种极端对立的看法:其中一方以高扬普遍性而贬斥特殊性的柏拉图为典型,另一方则以否认永恒意义而“为多样性欢呼”的后现代主义者为代表。

^① 引语见本书第一章首句。本书译文均取自中译本《异中求同:人的自我完善》。

瑞恩根据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形而上的一”(metaphysics of the One)与“形而上的多”(metaphysics of the Many)的提法,依循白氏关于生活是“变动的一”(oneness that is always changing)的判断,分别对这两种趋势加以批判,并提出应当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二者: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消解由来已久的“非历史的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特殊主义”,以“活的历史”(the living past)之眼光来结合“人文主义”(旨在道德上、文化上尊崇和发扬个人的最高潜能)与“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观点,并最终建立人类“更高层次的生活”,这就是“人类共同的基础”,亦即共同的“伦理核心”,只有以之作为生活中的“具体规范”(the concrete as normative),人类才能得享真正的和平与幸福(eudemonia)。——这就是瑞恩在当前多元文化世界中所坚信的核心价值与意义。

三、瑞恩背后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理性”、“想象”、“意志”诸概念

瑞恩在新书序言中说,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特别详尽研究并大量运用了白璧德的思想。实际上,无需作者自承,每一个了解白璧德思想的读者都可以一眼看出,在瑞恩背后耸立着的正是白璧德巍峨的身影。首先,本书的基本思路完全是白璧德式的。在哲学上达成“一”与“多”的融合,是为了解决现实人世的问题,这是白璧德在其“新人文主义”系列中一再向读者耳提面命的主题。其次,瑞恩给出的“一多融合”的手段,无非还是用白璧德意义上的“意志”来取代“理性”,并配以“想象”来节制卑劣的人性这一新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其中涉及到的多个重要概念,我们将在下文——分说。)甚至瑞恩行文的风格,与白璧德相比,也时常几可乱真,——对时人时政毫不妥协地加以批评(如在本书第六章对当前行时的列奥·施特劳斯及其弟子阿兰·布鲁姆的批判),但又往往以讥诮的口吻出之,比照读来,令人不禁莞尔。从主题、到解决问题的手段,乃至风格来看,本书简直可以说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著作在当代的一个翻版。一方面会被人误认为是道德训诫,另一方面又不免会刺痛某些人的神经,瑞恩(和白璧德一样)对自己的这种“不合时宜”有着充分的自觉,他在书中曾感叹自己的建议并不为时人所接受,这更令人想起了上世纪初白璧德的相同遭际。不过,一个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信徒,并不惮于“与世皆违”。瑞恩不但自己频频出版著作宣扬白璧德的思想,而且

作为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所长和所刊《人文》(Humanitas)杂志的主编,更将《人文》事业与白璧德联系了起来。这份杂志可以说完全是以白璧德思想为指归与依托的,因此成了宣扬新人文主义的核心刊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就是当代美国的《学衡》。瑞恩已不单纯是受到了白璧德某些理论的吸引,而更是与后者的学术人格与理想达成了全面的认同。不过,他对白璧德是否真的心折至斯、以至全无自己的批判呢?

先来看“一多融合”的主题。关于特殊性与普遍性应当统一之构想,当然并不是由白璧德首次提出的。白璧德曾引述(所谓标举“形而上的一”)的柏拉图的话说,有一(the One)与多(the Many),“如果有人能使一与多相结合,我将追随他的脚步,如同我追随神的脚步”。不过,白璧德认为希腊人普遍没有将适度的法则和一与多的问题联系起来,其中也包括亚里士多德,他也没有将自己有关思辨生活的理论、或达到神性的统一感的理论,与其作为调节各种极端之手段的德行理论结合起来。^①在白璧德看来,协调一与多无比艰难,但这正是真正的人文主义的任务。问题是,白璧德所提出的这一“任务”,至少早在黑格尔那里便已得到了完满的理论解决。黑格尔的“一个这样的,通过否定作用而存在的单纯的东西,而是一个非这一个,同样又毫无差别地既是这一个又是那一个”的“普遍的东西”,^②岂不既是一、同时又是多,或云一与多的具体融合?——惜乎白璧德竟瞠目未识。白璧德终生对实用主义抨击甚力,与实用主义“神圣族长”杜威的关系十分紧张,然而在白氏眼中,“做一个实用主义者”,比做一个“投身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人”都要“好得多”了。^③白璧德一方面对所谓的“形而上学”有着近乎天生的排斥,另一方面则对他所倾心的佛陀、孔子、耶稣,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大人文主义者”的实践向度充分认肯,从而特别推崇面向人生“经验”的“良好的判断力”(good sense / practical judgment),同时他又以最为现代的现代人自居,因此极力强调现代实证与批判(positive and critical)精神的重要性,不过,就他对“黑格尔

式形而上学”的轻率点评看来,多少带上了他自己所批判的“伪古典主义”(pseudo-classical)式的僵硬态度,未免够不上 positive 与 critical 了。不过,任何一个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西方学者可能都无法避开黑格尔的影响,特别是瑞恩对于黑格尔还相当的亲熟,如瑞恩在本书第十章、即最后一章感叹说:“不幸的事,西方一直到黑格尔那里才真正认识到人类经验的辩证与历史本质”,对黑格尔可以说推崇备至。但是,瑞恩在本书第八章明明已经谈到黑格尔“力图使人更具历史感地、更精微地理解普遍事务与特殊事务之间的关系”,眼看就要切入正题,接下来却笔锋一转,又说我们应当抵制“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等观念云云,结果便把这个话题模糊地一笔代过了。

问题是,早在 1986 年,瑞恩教授就曾著有“白璧德与实在问题”一文,专门检讨批评过白璧德所认定的“面向最高实在”(即实现人生经验中的“一多统一”)的根本途径。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批判白璧德的核心见解用力极深。这篇文章涉及到了白璧德的“意志”、“想象”,与“理性”诸核心概念,在此我们不妨先就这些概念解说几句。

在白璧德看来,所谓的“理性”并不具备最高的道德权威,不能担负节制人心的作用,真正能对人的卑劣欲望产生克制作用的只有“意志”。他坚持认为人的意志具有二元性,永远挣扎于高级可能性与低级可能性之间,这分别就是人类的“高上意志”(the higher will)与“卑下意志”(the lower will)。在个人内心达成“高上意志”对于“卑下意志”的制约、即“内在制约”(inner-check),是“止于至善”的根本途径。关键在于,这种“内在制约”如何才能得以实现?白璧德随即搬请来了一个新的概念,即“想象”概念。在此“想象”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fiction”(虚构)或“illusion”(幻想),而是人们借以把握与“多”和“变”难分难解地融合在一起的“一”的手段,且借此始有望建立一种“合理的模仿的范型”(a sound model for imitation)。白璧德认为,人类存在的高下两极都是在想象中、或曰“模仿的范型”中表现出来的,在“高上”与“卑下”的永恒斗争之间,人性正是依靠想象“保持着均势”。“想象”由此也相应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伦理想象”(the ethical/concentric imagination),另一种则是“卢梭式的想象”,或云“阿卡迪亚式的离心想象”(the Rousseauistic/Arcadian eccentric imagination)。在白璧德看来,人格主要是通过“伦理意志”(the ethical will)(即“高上意志”)及其引起的想象类型之间的相

① Irving Babbitt,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8, pp.25—26. 该书译文均取自中译本《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8页。

③ Irving Babbitt,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8, p.27.

互动而面向实在的,也就是说,“高上意志”将通过“伦理想象”的作用而实现“内在控制”。回过头来,“理性”在白璧德那里最终被定义为三个层面:1、笛卡尔式的抽象的、几何意义上的“理性”;2、约翰逊博士式的“良好的判断力”(good sense),这渐次表现为对某些特殊领域乃至整个时代精神的直觉把握;3、“想象型的理性”(imaginative reason),人们可以通过它超越一时一地的局限,并把握“上天不成文的律法”。^①

我们注意到,白璧德所定义的理性,即第三种理性,其重心完全回落在了前面的那个限定词——“想象”——之上,从而这个限制性词语成了实际上的白璧德理性概念的中心。归纳起来,“理性”不具备最高的道德权威,因此白璧德用“意志”的概念取而代之。“意志”又分为“高上意志”与“卑下意志”,为达成“高上意志”对于“卑下意志”的“内在制约”,我们需要插入“想象”的概念,特别是通过“伦理想象”的作用而面向实在,其结果便是,“理性”概念已被“想象”概念完全架空。与其使用所谓的“想象型的理性”,还不如单纯使用“想象力”来的直接。这时问题出现了:我们将从何保证“想象”具备所需要的“伦理”范型?此间是否仍然需要“理性”力量的介入?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才有了修正过白璧德的“理性”概念,即“想象型的理性”。也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不能实现控制,最终要依靠想象的力量,反过来,想象要行使职能,又不得不再次诉诸理性(只不过这一回是“想象型的理性”)。如此一来,我们就跟随着白璧德进入了一个完美的循环论证。

事实上,白璧德著作最薄弱的部分就是理性的概念,这其实是许多白璧德研究学者的共识。瑞恩在《白璧德与实在问题》这篇文章中,处理的就是类似的问题。在瑞恩看来,白璧德在理解实在问题上,过分强调了“实践标准”的终极性,此时他显然相对轻视了理性的作用。如果人与实在最重要的关联不是理性、而是无须中介的直接的生活经验,那么“内在控制”实际上就成了一种“强行插入人的意识”的“超验的善”,从而白璧德事实上是将“实在”着落在了非理性的基础上。接下来,瑞恩——以真正的黑格尔的精神——坚持认为,真正的哲学理性与人的直接自我意识完全可以相容,与白璧德认定的实用的、分析的理智不同,当普遍

性在具体的经验中显现自身时,真正的“哲学理性”是能够赋予普遍性以反思性的自我意识的。由此瑞恩进一步批评说,令人遗憾的是,白璧德对此却未作系统考虑,甚至在自己的著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哲学理性而不自知云。^② 瑞恩一眼看到了白璧德理性概念的最薄弱处,发现实际生活经验中的“意志”如果缺乏理性制衡,其“内在制约”只能是一种“超验的善”,这一判断正中要害,几乎可以当作定论。我们看到,瑞恩在17年前对于白璧德的批判可谓虎虎生风,而在2003年的新著中却三缄其口,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超验的善”一句酷评,确乎可以为整个“新人文主义”盖棺,不过,瑞恩本人便找到解决根本问题的新的有效途径了吗?他所提出的“人类共同的基础”,其根本保障又在何处呢?瑞恩首先认定存在着“超越个人的意义”(transpersonal meaning),然后他据此指出,人们在超越了阻碍真正交流的各种障碍之后,便会“直觉到”(intuit)自身和他人具有一种共同人性(见本书最后一章)。这种推理方式,是不是多少也有点“超验”的味道?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瑞恩教授的北大讲座,“大抵未出黑格尔的圈子,不过更侧重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对(新)雅各宾主义及后现代多元文化思想予以批判”,但“其对于‘更高人文基础’的先验肯定,仍与黑格尔一脉的古典人文思想符合若契”。^③ 瑞氏的“更高人文基础”,岂不是又一种“超验的善”?

本来,瑞恩在1986年对于白璧德的批判,是结合了“现代批评精神”对新人文主义理论进行的批判与反思,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在“永恒的原则”与“历史主义”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的努力,这直接攫住了“新人文主义”的精神与灵魂,真正符合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批判精神,也正表现出了“人文日新”的精神。不过,我们在此要追问一句,究其根本,所谓“人文日新”是否真的可能?——单就西方哲学传统而言,任何一个新的哲学概念对前一概念的反拨与扬弃,都只不过引发了下一个概念对自身的反拨与扬弃,事实上,所有这些概念都只是“神”这一终极概念的各种变体,不论是“理念”,或是“绝对精神”,或是“意志”,又或是

^① 关于以上诸概念的详尽阐述,主要可参见白璧德之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的导言部分,第三(Romantic Imagination)、第四(Romantic Morality)、第十(The Present Outlook)各章节,以及所著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一书的导言,第三章(Burke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及文后附录 Theories of the Will。

^② 参见瑞恩,《白璧德与实在问题》,载于《人文主义:全盘反思》(美国《人文》杂志社,三联书店编辑部编,多人译,2003年3月),第81—109页。

^③ 参见张沛,《对“一”的信心》,载于《跨文化对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五期,第81页。

“直觉”,从“理性”到“非理性”,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唯心”到“唯物”,形形色色,彼此看来决不相类、甚至相反,然而都无非是对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解答而已。是以从古至今,一切问题都是老问题,而每一个新答案都不过是又一轮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罢了。所谓“人文日新”,其真正内涵恐怕就蕴藏在亘古不变的“一”“多”问题当中:“人文”为“一”,“日新”者“多”,历久而弥新,殊途而同归。倘若瑞恩果然找到了“新”的答案,恐怕还是会与白璧德“狭路相逢”,这或许就是瑞恩缄口不言的原因了。

四、结语

大化生成,宇宙构造,第一推动力,终极目的,这些都与世间的渺小造物——人类何干?然而,这微不足道的人类,一定要在无序的混沌中造出一个合理的宇宙来!人生而是寻求意义的动物,这本是人类的宿命。那么,“超验的善”便“超验的善”,又有何妨?有人对此早已一语道破:

看来还真让休谟说中了:哲学仅仅使我们意识到自身的盲目与无能,但丝毫无助于发现作为“最后原因”的“神秘本质”(《人类理解研究》)。

但人类偏生立下屠龙之志,要解说这“既不是这一个,也不是那一个,而是一个非这一个,同样又毫无差别的即是既是这一个又是那一个”,这大约也是一种本能吧。虽然有些东西,如“我的一”,连圣人都“不知”、“不能”,但我们对之却能够相信。正是凭了这种“信心”(will to believe),人类才得以在这个不那么完美的世界上,劈开一条生路,向着他所认为的正确方向踽踽前行。^①

作为所有“目的之目的”的那个“善”,归根到底,只能是“超验的”。而所谓“超验的善”,最后只能着落在我们对“善”的“信心”之上,——尽管这“信心”本身也根本无从解说起。在瑞恩这里,白璧德的“the higher will”化成了“the will to believe the Common Human Ground”。瑞恩在 17 年后又“回到”了白璧德的身边,或

者说,瑞恩对于白璧德,其实从来都不曾离弃。《人类共同的基础》一书、乃至作者出版本书的行动本身,正表现出了一个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信徒对于自己在当前这个世界所看到的核心价值与意义的坚信。白璧德的“内在制约”,除去那些芜杂糊涂的论证循环,核心只是一句“我相信”,瑞恩的“人类共同基础”,核心亦只是一句“我相信”!——我相信,这就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彼此心照而坚心共守的一份秘密。

2004 年 9 月 24 日于北大

^① 参见张沛,《对“一”的信心》,载于《跨文化对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 1 月)第五期,第 83 页。